

# 拜“鬼神”的知识分子们

本报记者 张洪波 张榕博

在新文化运动中，曾出现过一短暂的“鬼神派”，它的大名是“上海灵学会”。如今，除了极少数专业研究新文化运动的书籍和文章外，人们已经很少看见这个名字。其实这也不奇怪，即使是上海灵学会的主要人物陆费逵，这位赫赫有名的中华书局创办人，他的人生履历里也只会出现“著名教育家和出版家”的字样，这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“为尊者讳”吧。

陆费逵，人家其实复姓陆费（读lù bì），名逵。千万不要以为信奉鬼神的人都是穿着黄袍马褂的老古董、老顽固。在年轻时期，陆费逵就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，入新式学堂读书，是个热血革命青年，曾加入日知会，常在报刊上写文章鼓吹革命，后来因为一些出格的文章触怒张之洞，只得亡命上海，在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做事，兼任《教育杂志》主编、记者，提倡教育革命。

1912年元旦，陆费逵自立门户，创立中华书局。1917年，就在上海，他与俞复、丁福保等走到了一起，创办上海灵学会。

俞复是江苏无锡人，正经八百的举人出身，参加过康有为的公车上书，倾向于维新与革命，后来加入同盟会，还办了一个“少年进德会”，后任上海文明书局总经理。他的同乡丁福保更是一个大学问家，中西兼通，对医学、词章、考据、钱币学、佛学都很擅长，还精通日文，一生著作无数，他编纂的《佛学大辞典》到现在也是经典。

上海灵学会的支持者中，有翻译《天演论》的严复，有民国外交官员伍廷芳——世人称之为“伍博士”，人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英国留洋博士，伍博士经常拿着三张他在美国拍的与鬼合影的照片，到处给



【陆费逵】



【丁福保】

人看。此外还有郭仁林、欧阳溥存几位。可以说，这是一个完全由当时的高等知识分子，甚至留洋知识分子组成的“鬼神派”。

知识分子信鬼，真是见了鬼了！

当时，上海灵学会实行会员制，下面设有盛德坛。其思想内容也是中西合璧，既结合了西方和日本的灵学、催眠术以及给鬼魂照相，还有中国传统的佛道思想，以民间宗教为基础的扶乩仪式，文化上太复杂了。

“吾知自此以往，必能于人生问

题，有所解决，古学复兴，尚其次也，必能使人神之间，声气相通，扣疑解难，尚其次也，呜呼，道德沦丧，学问衰退，至今而极矣。世之君子，其亦有志于斯欤。”《灵学丛志》第一卷第一期的“缘起”中这样写道。

从上海灵学会的宗旨和活动来看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陆费逵他们成立上海灵学会绝对不是为了营利，其初衷是为“道德沦丧”的中国寻求出路：通过鬼神之说和灵魂教育，约束人心，挽救道德沦丧的社会，重新建立一个“道德理想国”。

这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有关。清末民初，中国被西洋枪炮打败，中国传统的宇宙观、人生观、社会政治秩序土崩瓦解，他们既不信服西方，也不相信中国，苦闷的知识分子们都在寻找新的出路。从他们的思想学说中，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窥见儒学的影子。

有一点很有意思，在以往的扶乩中，大多是求药问方，问事问前途，多是私人事情。可陆费逵他们在扶乩时却多问一些公共事务，比如问柏林战况、中华书局发展、如何导正社会风气，以及音韵学、易数等。

在那个百花争鸣的时代，陆费逵他们的世界很丰富，各种鬼神冒出来，充满神秘的气息。而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、刘半农、钱玄同等人的世界也很丰富，他们的世界没有鬼神，却有德先生和赛姑娘，那时候有人高喊“孔子死了”，有人就敢高喊“鬼神来了”，只有将这些丰富多彩的两极世界合起来，才是真正的新文化运动。

1918年1月，随着《灵学丛志》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，双方终于拍了起来。“仆审现在所出书，无不大害青年，其十恶不赦之思想，令人肉颤。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鬼，至于为徐班侯灵魂照相，其状乃如鼻烟壶。人事不修，群趋鬼道，所谓国将亡听

命于神者哉。”——鲁迅在给朋友的信里这样写道。这已经算是很客气的了。后来，《新青年》直接把《灵学丛志》当成了活靶子，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、刘半农、陈大齐、刘文典、易白沙等人抄家伙全上，各种骂各种损各种讥讽，“妖孽”“愚民”“鸦片”“鬼魅”不绝口，1920年，《灵学丛志》被活活骂得停刊了。

上海灵学会解散后，主要人物各奔东西。陆费逵继续他的“教科革命”，终成为一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出版家，1941年，他病逝于香港。时至今日，知道陆费逵的人不多，但知道中华书局的人却不少，而“上海灵学会”这段历史，已经在他的人生履历中消失了。另外一位大人物丁福保在上海行医30年，于应诊之外，注经著书。

历史从来就非直线一条，而是充满百折千回，也许我们该翻开那些发黄的旧刊旧报，以及尘封已久的书籍，重新进入陆费逵等人的心灵世界，看看他们的鬼神信仰，究竟有着怎样的思想根源。“或许他们的思想谈不上有多深刻，但是，他们重新被发现，至少展示了一个更加多元的新文化运动思想世界。”

后来，关于鬼神的故事远没有结束。上海灵学会解散后，1920年，北京成立另一个灵学组织“悟善社”，创办《灵学要志》，后在北伐战争中烟消云散。1923—1924年，文化界又爆发了“科学与玄学”的论战，但此时赛先生早已深入人心，胜负很快分明。

只是到了今天，一些鬼神的东西反而又说不清了。

本文参考《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“鬼神”信仰——以陆费逵为中心的研究》、《民国初年上海的灵学研究：以「上海灵学会」为例》等文章。

# 梅光迪：大刀向胡适头上砍去

本报记者 陈玮

1909年秋的一天，20岁的梅光迪正在复旦公学宿舍里看书，一个陌生人突然到访，这人便是同舍友胡适的宗弟。梅光迪觉得眼前之人形态儒雅，见识非凡，与之相谈甚欢。只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个人在十年后影响了万千中国人的命运，也影响了自己的命运。

此后两年，二人先后考上了赴美留学生。到了美国，那位朋友改了一个好记的名字——胡适。他们经常互通书信，相互鼓励。梅光迪庆幸，自己遇到了“同道中人”。在胡适由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转入文学院时，梅光迪对他说，你的才能不是老农，而是堪比辛弃疾、陈亮等大家，你弃农从文的做法，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关键，将来会在中国文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。

日后，胡适果真成为中国文学革命的执牛耳者，而那时候的梅光迪再回忆起这段往事，估计只想抽自己两巴掌。

他发现胡适并不是“知音”，还要从1915年夏说起。这年梅光迪从西北大学毕业，闲来无事，便到康奈尔大学看望多年的笔友胡适，并与任鸿隽、杨杏佛一同讨论文学问题。对于胡适提出的“作诗应如作文”、“新潮来不可止，文学革命其时”，梅光迪极力反对，他认为现在不是文学革命到来的时候。不过胡适不管他，仍然搞“白话作文”研究，称“古字皆死，白话皆活”，这让从小泡在古书堆里、12岁就中童试的梅光迪大呼“忍不了”，他不断给胡适写信，称白话没有经过美的锤炼，没有永恒的价值，如历世相传，则粗鄙不



【梅光迪】

堪。那时，梅光迪还认为自己是胡适的诤友，把胡适往文学正路上引导。直到胡适把一首长达千字的话诗寄给梅光迪，称“人闲天又凉，老梅上战场，拍桌骂胡适，说话太荒唐……”梅光迪气得跳脚大骂：别剽窃这种不值钱的玩意儿来糊弄我们中国人！

自此，两人在文学道路上分道扬镳，也为以后的“学衡派”与《新青年》之争，埋下了最初的种子。

为了守住传统文学的堡垒，梅光迪与一大批在美留学生一起，反对胡适的观点。正当梅光迪为自己占据优势，嘲笑胡适“自以为是”时，1917年，胡适丢下《文学改良刍议》这颗重磅炸弹，回到中国，跟着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干起了文学革命，举

起了“白话大旗”，一向执著于学说理论的梅光迪傻眼了，这家伙来真的啊！

梅光迪紧急发表文章《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》，直言过于猛烈的挣脱容易导致中庸的丧失。同时，他在美国招兵买马，准备回国后与胡适、陈独秀决一死战。就在这时，他认识了同在美国留学的吴宓和胡先骕，梅光迪甚至在吴宓面前痛哭流涕，称中国宝贵的文化被胡适之流糟蹋云云，让同样属于文化保守派的吴宓感动不已。由于同受哈佛大学白璧德“古典人文主义”的影响，他们主张寻找中国文化中可与之媲美的部分来发扬光大，在世界立足。于是古典诗体之美就成为可媲美于希腊古典美学的“技术完美之域”，同时，他们将希腊古典美学的核心，归结为“中庸”，成为他们日后的思想武器。而对梅光迪来说，这是战胜胡适的筹码。

1922年，回国的梅光迪到东南大学任教，带领吴宓、柳诒徵、胡先骕等创刊《学衡》杂志，矛头直指《新青年》，力图维护古代传统文化，反对文学革命。因为有留美学生的背景，他们主张古今中西文化融会贯通，承认“人本”，但是却把孔子看作是人文思想的鼻祖，站到了时代大潮的对立面。

在《学衡》第一期上，梅光迪对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开火。也许是在美国憋得太久了，梅光迪回国后向胡适开的第一炮格外猛烈，原有的宽容精神消失殆尽，言辞尖刻无情，甚至近于谩骂、诋毁。梅光迪痛恨胡适等人身居学界要津，却蛊惑青年学生，成为政客，“为其功利名誉之代价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”

同时，胡先骕发《评尝试集》，认为文学之死活，以其自身价值而定，而不是文字，继续反对白话文主张。汤用彤、陈寅恪、梁启超、王国维等都为《学衡》撰稿，攻击新文化运动。并且广泛翻译介绍古希腊以来西方各种思想文化和文学流派。对于战胜胡适，那时候的梅光迪是相当自信的。

但是，梅光迪恰恰忘了，当他回国的时候，教育部已颁布命令，小学一二年级国文课本全部改用白话文，不久大中小学教材全部改用白话文。胡适领导的文学革命，已经成为大势所趋，以至于梅光迪在暑期学校大讲宏论时，没几个学生来听，反而他大骂胡适时，却激起了学生的反对，与梅光迪当堂理论起来。在新文学阵营的回击下，《学衡》势力显得十分单薄。邓中夏从政治上揭露了学衡派与研究派、无政府党是一丘之貉。鲁迅抓住了学衡派许多文言之上的错误予以批评：“衡”了一顿，仅仅写出了自己的铁嘴。”像是“壮志未酬”的英雄，梅光迪在那时显得十分落寞。

由于梅光迪眼高手低，缺乏实践空谈理论，所以作品并不多见，《学衡》实际由吴宓主持。此后受发行量的限制、成员出国游学以及资金的短缺、东南大学合并等事情的影响，《学衡》的计划被打乱，而内部人员也因吴宓独揽编辑大权，产生了不少分歧，使得本就摇摇欲坠的《学衡》雪上加霜，1932年冬，《学衡》停刊。而在这场大战中败下来的梅光迪，自此再也未能与曾经的好友胡适同桌就餐，畅谈文学。